在很多人看来，中世纪早期仿佛野蛮的黑暗之海，古代世界的种种成就则是海那边的一束微光，而“罗马帝国在5世纪的陨落”（该帝国在东方的长期延续被无视）是一次根本性的失败，扭转这一失败需要经历漫长而艰苦的过程，但他们也承认，构成现代社会的各方面要素 正是在这一时期奠定了基础。这些要素包括理性主义、生产力、全球市场、知识、民主、平等、世界和平，以及免于被剥削的自由。

我个人对于最后这些产物大多是认同的，但身为历史学家，我还是认为这种故事线太荒谬。

作者克里斯·威克姆在本书中的努力，是对上述说法的修正，既强调中世纪早期欧洲对罗马帝国晚期的继承性，又关注不同地区所呈现的差异。但无论如何，即使我们现在并不认可文艺复兴以来传统的对中世纪全面否定的看法，我们也无法否认这一时期的欧洲社会表现出近乎全面的衰退之势，如果说这也是对罗马帝国特征继承的一部分的话，应该说，这一倾颓的迹象已在狄奥多西逝世后逐渐明显。至于所谓“根本性的失败”云云，这倒的确是某种不合时宜的“目的论”观点，而且即使以近代化作为“历史哲学”的目标，罗马帝国的灭亡却可能是促进而非抑制了这一进程，虽然其间的坎坷颇为曲折。而“延续性”的说法，其实也并不止在欧洲中世纪成立，只要是不由外部强力因素介入（如蒙古入侵）下的政治变化，历史的延续性与变革性同样重要。

比较本内特和霍利斯特的《欧洲中世纪史》，本书的叙述在公元1000年截止，但对公元400年-1000年间欧洲（包括阿拉伯帝国的西亚）历史的讲述，要来得远远细致而丰富。本书这样巨大的体量，致使我们的笔记也无法在有限的篇幅里面面俱到，以下以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欧洲地区最有影响的三个主要政治实体为讨论对象。

首先是东罗马帝国，在本书中，作者将七世纪早期（609-642年间）帝国所面临的一系列灾难性事件，视为东罗马向“拜占庭”的关键性转变。从此以后，虽然拜占庭帝国还经历了一段时期的繁荣（马其顿王朝，867-约1056年），但总体来说，拜占庭是在为维持生存而努力，四面环绕的强敌，加之内部结构性的危机，无力重现古罗马的荣光。这一点突出表现在希拉克略开始的“塞姆制”军区改革，这一防御性质的改革使得地方社会大体上被军事化，或许这也正是导致拜占庭时期的帝国不比古罗马文化更为活跃的因素之一。

在7世纪到9世纪的相当长时间里，拜占庭最大的敌人就是崛起于阿拉伯半岛的伊斯兰帝国，至少在不连续的近两个世纪的时间内，伊斯兰的两个王朝（倭马亚王朝与阿拔斯王朝）都是罗马帝国旧址上最为强大的政治存在，这既体现在军事实力上，也表现于文化的创造中。如果没有新的资料推翻这一结论，我们可以说，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到文艺复兴以前，以古希腊为源头西方文明，阿拉伯人（至少是伊斯兰帝国治下的学者）拥有其最为先进的知识，并做出了最为突出的贡献。但似乎神权政治的国家，其兴也勃，其衰也骤，在9世纪中叶阿拔斯王朝的内战之后，阿拉伯帝国迅速衰落，并在10世纪早期崩溃为数个大大小小的独立政权，失去了政治上的优势地位。

上述两个政治实体对现代欧洲文化（主要是发展程度最高的西欧地区）的影响，间接的作用大于直接的作用，而拜占庭文化的影响又更小些，现代欧洲文化基本上是从法兰克王国的遗产的地基上发展而来。但奇异的是，即使是在法兰克王国最辉煌的查理曼时代，其发展程度也无法与强大的阿拉伯帝国或是有着悠久传统的东罗马相提并论，相较之下，当时更为“野蛮”的地区反倒是后来居上，其间必然有某种机制在发挥作用。加洛林王朝之前的墨洛温王朝则要更为“落后”，我们的分析因此也将从加洛林王朝的第二位统治者，被誉为“欧洲之父”的查理曼说起。查理曼除了极大的扩充了帝国的疆土，并在罗马被加冕为“罗马人的皇帝”外，其文化政策上也推出了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措施，发展了所谓“道德化政治行为”：让国家政权和半自治的教会建立起了更为紧密的联系，统治者可以任命自己的主教，但主教也有义务监督道德世界。这一改革似乎部分出于加洛林家族强化统治根基的目的，其实对政治的道德化需求并不只作者说的，仅仅是罗马晚期以来的传统，前基督教时代罗马最为繁荣的时期，斯多葛主义的道德哲学也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只不过特别的是，查理曼的“宗教道德”运动大概是西罗马灭亡以后的首次有较大影响的文化复兴举措，而且是以基督教理念为指导，但显然，这一中世纪早期文化复兴的尝试，其作用时间极为短暂，随着加洛林世界在9世纪后的终结而结束。额外值得注意的一点，加洛林的的宗教改革，与拜占庭800年左右复兴的著书之风，以及阿拉伯著名的“百年翻译”运动，基本发生在同一大历史时期内，这大概不只是一种巧合。

另一个值得提及的是法兰克王国的传统，国王去世时，其有继承权的后代将领土当作私产瓜分，有代表性地体现了西欧地区这一时期的“野蛮”特征。即使是查理曼，也曾计划将其帝国平分给自己的儿子们，只不过由于最后只有一个儿子活到了那个时候而让帝国“意外”地继续维持了一段时间的统一。如此“国家的私产化”实际上从最高层便模糊了所谓“公共”与“私人”的界限，如果说查理曼的道德计划是对公共权力的强调的话，那么继承制度（更重要的是背后所蕴藏的观念）中固有的的矛盾因素使得计划从一开始便无法成功。但我们以为，“公共空间”并不是在加洛林王朝后期才开始消失的，毋宁说加洛林王朝早期的统治者对恢复“公共空间”的尝试失败了。就上述材料来说，在“国家意识建构”上，中世纪早期的西欧也是远远比罗马帝国来得落后，“黑暗”的说法也未必全然不成立。

作者在本书的关注点，基本上还是政治的叙述，政治发展背后的结构体系当然也有所涉及，但总归不是重点，比如“封建”问题就没有进行深入的讨论。文化与政治的相互影响，当然也分析不多，整体上说，本书的注意力主要放在了对历史现象的描述而不是背后原因的探讨上。非世俗化的宗教氛围，是中世纪有别于古典时代与近代的重要特点，这当然也造成了不小的误解，比如相当长时间里，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时期，学者们不仅倾向于将罗马帝国的衰亡错误的归罪于基督教，同时也将中世纪知识文化水平的大幅度倒退看作是主要是基督教思想统治的结果。就各种现有的资料来看，中世纪早期，公元1000年以前，西欧地区基督教教会与贸易一样，呈现出相当程度的地区化特点，教皇的影响力在大多时候也相当有限，这也很好理解，因为文化的统一也需要足够复杂的经济系统的支撑，在欧洲普遍的衰落中，基督教会更多时候是以受害者而不是施害者的身份出现的。但是在这过程中，教会既是知识的保存者，也由于教会对知识的特定倾向，古希腊罗马典籍在西欧地区的遗失，教会也需负有相当的责任，但这一过程的具体细节，仍有待更多的资料。

作者在最后说得很对，“财富集中、剥削、贸易和政治权力都是一环扣一环的，每一环都可以（在应有的谨慎态度下）作为其他环节的参考——考虑到史料的残缺不全，这种参考往往是很有用处的。”思想与物质，制度与现实的交织在中世纪所提供给我们的信息十分有限，我们至今无法准确描绘出一个足够可靠的图景，只能够抱持着博学而谨慎的态度，尽可能还原历史的原貌。